

从苦闷之窗瞥见“时间缪斯”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秦三澍

俄国诗人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·布罗茨基的最后一本散文集《悲伤与理智》，日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，这也是出版社献给布罗茨基诞生75周年的一份礼物。

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·布罗茨基是少数几个横跨英语、俄语两个世界的文豪之一。他的第一部散文集《小于一》就震动了英语文坛，而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散文集《悲伤与理智》更是其散文创作的集大成者。

布罗茨基散文集《小于一》2014年几乎横扫国内所有年度好书榜单，让人真正见识到“小众图书”的“大众潜力”，也让布罗茨基再一次进入大众的视野。上海译文出版社此次翻译出版的《悲伤与理智》是首个中文译本，在翻译文学界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。



“苦闷就是你们的一扇窗户，透过它你们能看到时间，看到时间的一些特质。”多年以后，当我读到布罗茨基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面对达特默斯学院的年轻毕业生们所做的劝诫时，回忆起的将是他那首《我坐在窗边》的诗中，给人以节制之震撼力的最末一句：“我坐在黑暗中。难以分辨／哪一种更糟：内部的，还是外部的黑暗。”

“窗户”意象在布罗茨基的诗中频繁现身，这种惯性式的写作行为足以形成一个话题。他为数不少的“窗户诗”，从纸面上浮现出来的，是一个坐在屋内的窗边不断向外看视的诗人形象。这种姿态与伴随他终生“流亡者”身份，构成了某种深度的隐喻关系：布罗茨基，这位出生于苏联的列宁格勒，最终以美国公民身份领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，同时也是一位血统纯正、却未曾接受过民族文化熏陶的犹太人。这种身体与精神上的多重“流亡”状态，必然导致了——如他所自述——“有太多的身份需要去认同”（《克利俄剪影》）。

“颂扬苦闷”的意图

我在开头援引的《颂扬苦闷》一文，收录于他临终前的最后一部散文集《悲伤与理智》。这本成书于1995年的集子所收入的21篇散文，涵盖了回忆录、旅行记、演说、诗歌论稿、公开信和悼文等多种体裁。为这些视界纷杂的篇什赋予一个总括性的主题，是极其困难的；不过我们仍能从中拈出具有凝聚力的几个关键词：记忆、时间，历史，流亡。毋宁说，即便是那些以诗歌文本读解为主体的篇什，如《悲伤与理智》（论弗罗斯特）、《求爱于无生命者》（论哈代）、《九十年之后》（论里尔克）等，事实上也带有某种回溯历史记忆的意味。

我们有必要顺延着布洛斯基的上述“训诫”，一探他“颂扬苦闷”的真正意图：“当苦闷袭来，你们就沉湎于苦闷。……你们越早沉到水底，便能越快浮到水面。”他希冀我们借由“苦闷之窗”向外透视，在对“时间之无穷”和自己在时间中的“无足轻重”之间的对比中，感知到自己有限的尺寸与位置，以便更谦恭、更同情地善待同类。而这，便是“拥抱苦闷和痛苦”的最本质的意义。

流亡是“悲喜剧”

在历史的时间纵贯中，我们每个个体都是渺小的；而在同集所收的《我们称之为“流亡”的状态，或曰浮起的橡实》

一文，他告诉我们，“流亡”乃是“教授谦卑这一美德的最后一课”，因为一幅最深邃的“透视图”借由流亡的经验展现在流亡者眼前，一如济慈《伊莎贝拉》中那句充满巨大震颤力的诗——“你远在人类之中”：

消失于人类，消失于人群，置身于亿万人之中；做众所周知的那座草堆中的一根针，但要是有人正在寻找的一根针，这便是流亡的全部意义。

当布罗茨基将流亡者的家谱追溯至亚当——这位被逐出伊甸园的现实“失败者”——时，流亡已不仅是一种形而上的状态，而更关涉到流亡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的“悲喜剧”：他们从旧的社会与精神环境中自愿地抽离，却同样无法在新社会中扮演一个他们内心所期许的、有意义的角色。他们变得更加热爱回忆往昔（正如《悲伤与理智》全书对“记忆”的沉湎），甚而将从前那些真实的或想象中的读者，也纳入到了追忆对象的行列中。我们眼前似乎又浮现出那个临坐于窗前，在“窗”这个临界的象征物上进退维谷的姿态。然而，布罗茨基却坚称，流亡者由此采取的方式是“无视我们所面临的现实”，这意味着，“追忆”并不是为了将过去紧握在手里加以珍藏，而是推迟“现在”的来临，亦即为了延缓时间的流逝。

“时间”在这里又一次出场，似乎布氏眼中的过去、当下和未来都透露出某种不确定感。从专论“历史”的《克利俄剪影》一文，我们找到了更多确切的印证：“如果说我们与古代有什么共同之处，那便是虚无之前景”；他对“末世论”的皈依、对“缺席”而非“在场”的关注，对历史之“事实”与“阐释”的自觉区分，以及对历史的“戏剧隐喻”的激烈反对（他强调“历史并不区分舞台和观众”），都让我们看到，他对克利俄——古希腊神话中司掌历史的“时间缪斯”——的偏爱甚至崇拜，便在于她形象的不确定性，那非时间的、无规律的天性。她含混的神情暗示着我们，“历史的唯一法则就是偶然性”。

重新成为游牧者

历史总是在不知不觉中“撞上”我们，布罗茨基对一切规则性的运动模式的警惕，使他将恢复历史的“任意性感受”和它的“血肉”，看作紧迫的精神任务。他提倡的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历史客观性——“它更像是各种主观性之总和”；因为脱离躯体、脱离切身之感的智性，是毫无分量的，只不过是职业历史学家善于玩弄的一种修辞。关于第三帝国对犹太人

犯下的罪行，一切缺乏“激情”而只求“客观”的书写，在布氏那里都是失效的。一如他在《表情独特的脸庞》文中所复述的，当阿多诺质问“奥斯维辛之后还能写出诗歌来吗？”马克·斯特兰德反驳道：“奥斯维辛之后还会有午餐吗？”

布罗茨基鼓励我们在精神上“重新成为游牧者”，即便受限于各种现实条件，身体只能在特定的物理空间中“定居”下来。在这里，我们是否发现了“游牧”与“流亡”之间隐秘的关联？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他多年来形成的诗歌观念，也与这种历史意识相互交织、缠绕在一起，彼此提供着养料。他偏爱于诗歌中非确定性的“辩驳”声音，以及诗人与历史之间“势均力敌的相遇”，他对弗罗斯特《家葬》一诗的长篇细读（见《悲伤与理智》一文）即是一例。

而他也将这种历史感带入了自己对记忆的提炼中，譬如在第一篇回忆“二战”的《战利品》文章，那些连结着战争苦难的牛肉罐头、“飞利浦”收音机、“骨头音乐”X光胶片、父亲的高靿鹿皮军靴……在年幼的布罗茨基那审美目光的注视下，而成为带着历史灵韵的艺术品与想象之物，或者说是真正意义上的“自战争获益”的“战利品”：

透过收音机背面那六个对称的孔洞，在收音机阴极管闪烁的微光中，在由焊点、电阻和阴极管（这些东西像语言一样难以理解，在不断生成新的意义）构成的迷宫中，我认为我看到了欧洲。收音机的内部看上去永远像一座夜间的城市，到处都是斑斓的灯火。

从“收音机迷宫”的动人描写中，我们得以管窥，记忆如何在时间的流转中得以留存，如何在历史状态之“匮乏”与心灵状态之“丰盈”的对撞中，编织出了布罗茨基“个人史”的一幅幅图景。当布罗茨基在幼年接触到这些可供日后浪漫想象的素材时，他并不能预想到日后遭遇的国内流放和国外流亡生涯；或者也可以说，当他15岁时从八年级的课堂上离开并退学，便已经开始了某种广义的“流亡”生活，尽管那时他对于“流亡”的理解尚没有如下这般的深彻：“我们称之为‘流亡’的状态首先是一个语言事件，即他被推离了母语，他又在向他的母语退却”。

诗人在布罗茨基那里，就是一个“处于对语言的依赖状态”的人。从散文集《悲伤与理智》中，我们再次看到了一个临窗而坐的诗人，以诗的语言重述着他目力所及的一切：从历史的永恒流动中，“时间缪斯”克利俄不断变幻着她含混的神情。■

新书推介

《骑手和豆浆：臧棣集1991—2014》

作者：臧棣
出版：作家出版社
时间：2015年4月



《骑手和豆浆：臧棣集1991—2014》是“标准诗丛”第二辑之一种，被称为中国新诗的标杆之作。全书遴选著名诗人臧棣不同时期代表作品，公分六卷，五卷诗，一卷文。五卷诗收录诗人不同时期、不同风格的代表作。

臧棣，1964年4月生在北京。1983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。1997年7月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。现任教北京大学中文系。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研究员。

《小词大雅——叶嘉莹说词的修养与境界》

作者：叶嘉莹
出版：北京大学出版社
时间：2015年4月



小词如何从爱情的品格升华到人生的境界，如何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儒、释、道的修养？读者又如何能够从小词中领略这种修养和境界？叶嘉莹女士将为您细细评赏，虽小词，大雅存焉。

叶嘉莹一生从事中国古典诗词的教研，擅长以深入浅出的文字，把当代西方文学概念融会、应用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探讨和诠释。她天资敏慧，才思出众，加上典雅细腻的文笔，以及浮世坎坷的忧患经历，使她在谈诗论词之际，以直悟配合精析，见解独到，卓然成家。

《巴托比症候群》

作者：(西班牙)恩里克·比拉·马塔斯
出版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时间：2015年3月



《巴托比症候群》最早出版于1999年，是作者的第十八部作品，甫一问世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取得了包括法国梅迪西奖、巴塞罗那城市奖等在内的多项欧洲文学大奖。2004年，《巴托比症候群》被译成英文在英美出版，作者得到了世界性的关注。目前，《巴托比症候群》已经被翻译成超过二十种语言在全球发行。作者被誉为博尔赫斯与卡尔维诺的当下传人。

《巴托比症候群》以美国文学巨擘赫尔曼·梅尔维尔的《抄写员巴托比》为楔子，叙述一位上班族，为克服自己25年来未曾提笔的心灵创伤，用书写一个月的日记的方式，穿插页脚批注，评论了一些“看不见的文本”，开启了一连串他对文学的探索与诘问，解释作家创作与不创作的理由。

随着《巴托比症候群》取得的巨大成功，作者逐渐被其他语言国家的读者接纳，影响力迅速扩大，并被媒体看作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又一热门人选。